第39卷 第4期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39,No. 4
2025年7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Jul. 2025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5.04.002

“魂脉”和“根脉”的内在契合与互相成就*

吴云志,孙扬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新总结和新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既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的理论关注,也对二者的关系作出了哲学澄明。正确理解“第二个结合”,要以廓清“魂脉”和“根脉”在结合中存在的误识为前提澄明,进而对二者在理论特质、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中呈现出的内在契合性予以全景式透视。“第二个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进而在双向赋能中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A81;G12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5)04-0009-08

The Inner Fit and Mutual Fulfillment of the “Soul Chakra” and the “Root Chakra”

WU Yunzhi,SUN Yang
(School of Marxism,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The second integration” is a new summary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and also a scientific proposition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proposition not only expresses theoretical concern for the “soul chakra” of Marxism and the “root chakra”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but also provides a philosophical clar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second integration”,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isconception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ul chakra” and the “root chakra” as a prerequisite,and then provide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intrinsic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their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ways of thinking, and value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activ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Marxism,nourishing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a new cultural entity through mutual empowerment.

Key words: Marxism;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second integration

* [收稿日期]2024-11-1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40年的经验总结与发展启示研究(L24ZD023);大连海事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
[作者简介]吴云志(1965—),男,辽宁大连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 引 言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和建设过程中面临诸多棘手问题,但贯穿其中的理论主轴仍然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思想分野,二者不可共存。然而纵观党的百余年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表征和思想火花长期存在于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只不过这种存在是一种用之不觉的自在状态。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即"第二个结合"。这既弥合了二者之间的思想分野,也将"第二个结合"提升至更为显性的位置,使其以一种自为的状态显现。于是,学术界围绕"第二个结合"掀起了研究热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 习近平总书记视马克思主义为"魂脉",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因此,"第二个结合"呈现的是"魂脉"与"根脉"的交相互渗。当前,在把握"魂脉"与深植"根脉"的辩证统一中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意蕴,对于推进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二 前提澄明:廓清"魂脉"和"根脉"在碰撞与结合中存在的误识

从学理上审思"魂脉"和"根脉"的彼此契合与互相成就,应将研究视野回溯到二者产生直接联系之初,并沿着历史发展的演进逻辑进行详察细观。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非历史主义地争论二者高下优劣的错误思想倾向,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认知并非不证自明的先验性存在,而是亟须予以澄明的前提性问题。对此,我们应避免对这些错误认知的含糊回答和避而不答,而应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和匡正,从而为深刻理解二者的有机结合奠定思想基点。

(一)关于"魂脉"和"根脉"结合可能性的误识

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便无法回避其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孕育于西方文明体系中的思想学说,与建立在中华民族农耕与游牧自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先天背景,存在着极大的理论视差。据此,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风马牛不相及,二者相结合是一件茫然无踪、扞格不入的事情。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为现实基础,进而夸大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性,以此否定二者能够结合的倾向和认知,是在二者结合可能性问题上产生的误识。这种"结合否定论"常见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变换,这种论调并未消亡,而是时隐时现。

在"结合否定论"问题上表现较为明显的文化思潮为文化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发轫于中西方思想文化角逐交锋和诸多社会思潮迭起的变革时期,它以虚无为致思逻辑,通过形而上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试图在中国建立起"去历史化""去民族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叙事,以此消解文化发展的主体自觉,瓦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之根脉。文化虚无主义首先通过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扩大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在源头上切断了二者的结合。持论者视中国传统文化为糟粕和腐朽文化的代表,提出"劣质文化论"等错误论调。在反思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要求传统文化为中国的落后承担责任。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否定的偏激心态和片面立场,无助于全面客观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也便无从谈起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文化虚无主义除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凭借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虚无进一步否定"魂脉"和"根脉"结合的可能性。文化虚无主义以改良驳斥革命,意图消解革命文化的价值根基。持论者在歪曲革命史实、诋毁民族英雄中混淆大众视听,大肆宣扬"革命破坏论""革命过时论"等错误论调,以此否定革命的积极作用。文化虚无主义以虚构文化矛盾的形式宣扬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鼓吹文化取消主义,并虚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此破坏国人的文化自信。

文化虚无主义虽然以不同的言说方式表达其价值诉求,但其用心在于以激进的非理性的态度去苛责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以理性健康的心理去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与缺陷,片面夸大了"魂脉"与"根脉"之间的不对等性与差异性,机械地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在可能性层面上对二者结合进行了前提

否定。然而,文化间的求同存异和化异为同才是文化结合的主要方式。正如李大钊所言:“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2]311“魂脉”与“根脉”之间的表面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阻碍二者的结合,反而为二者的取长补短、互为补充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在当前思想文化领域形势复杂的情形下,我们要高度警惕并及时澄明文化虚无主义的逻辑理路与价值陷阱,避免其发挥消解作用。

(二)关于“魂脉”和“根脉”结合必要性的误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在中国本土传播时,势必会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化思潮为文化复古主义。文化复古主义论者长期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语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不可丢弃,主张重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地位,倡导全面恢复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肯以扬弃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质是一种食古不化的形而上学观念和文化自负心态。文化复古主义坚持以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观点于古代“经训”中寻找“国性”,推行“以儒待马”,试图用儒家思想消解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便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发展无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种文化思潮是对“魂脉”和“根脉”二者结合的必要性进行否定的现实表现。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崇儒、尊孔的思想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机,文化复古主义论重新抬头,“以儒代马”论此起彼伏,更有甚者提出以儒学革新政治和儒化共产党的主张。虽然文化复古主义表面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旗号,但其本质是以低级的文化形态来否定高级的文化形态,是思想上和文化上往回退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这一思潮既涉及中西之争,也关涉古今之辩。一些极端的新儒学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若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亟须复兴儒学。面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强力冲击,我们确实需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文化复兴等同于文化复古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要实现的传承和弘扬究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浸润下实现理论资源的发展,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将其上升至与指导思想并行的高度?答案是不证自明的。文化复古的基点是古,是以古非今,以过分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将本属于思想理论层面的文化观念延伸到指导思想层面,暗含着“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等错误论调;而文化复兴的基点是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追求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滋养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代表的是一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复古与文化复兴的实质性区别,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将其毫无原则地抬高,避免颠覆性错误的出现滋扰文化的发展。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价值观念和道德重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在倡导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情势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采取拿来就用的态度,更不能错误地将重视传统文化与推崇文化复古简单对等起来,而应“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3]708。“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指导审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给其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唱赞歌。文化复古主义以形而上和开历史倒车的思维方式对“魂脉”和“根脉”结合的必要性进行了否定,对于这种错误论调我们要充分把握其理论实质和现实危害,并及时予以驳斥。

(三)关于“魂脉”和“根脉”如何相结合的误识

如何在实践层面实现“魂脉”和“根脉”的结合是一项繁杂的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然而在二者如何相结合的问题上也长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认知,如在二者结合的路径问题上产生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机械结合论”。机械结合论者认为“魂脉”和“根脉”的结合是外部因素作用于二者的生硬拼凑和机械堆砌,所实现的结合是无的放矢、牵强比附的表面耦合,二者最终仍然以两种样态呈现。这种机械结合论没有深入“魂脉”和“根脉”的内在特质中去分析其内在会通性,而单纯将二者的结合理解为移植或嫁接,其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尤为明显,需要我们加以正视和反思。

教条主义是指罔顾时与势的变化,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条条,拒绝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种固有的认知方式疏离了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割裂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魂脉”和“根脉”结合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集中体现为想当然地从二者具备的相似性入手,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点进行简单的比拟和拼接,仅从外源性层面进行相似性论证,而未指明思想的普遍性和现实情境间的依存关系。马克思曾坦言:“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

他们自己的原理。”[4]7 实用主义是指从事物呈现的实际结果出发进行论证,而不是从事物自身出发进行推导。“第二个结合”问题上的实用主义表现为盲目分析二者之间的相通性和差异性,并未深入思考二者的思想精髓和理论特质。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大同社会的构想存在共通点,引发了人们的思想共鸣。然而真实情况却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已无法使当时的中国摆脱困境,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品格能够指引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救亡出路。因此,那种以二者浅表层面的相似性论证“第二个结合”的庸俗结合论,必然会导致二者无法实现有效对话。形式主义是指颠倒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关系,过多关注事物的外在形象而忽略了其本质内容。这与实用主义存在相似之处。有研究者指出,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利用还停留于遣词造句、话语表达和例证的运用上,还只是用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形式化、趣味化的言说和解释[5]19。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话语互嵌只是“第二个结合”的原初形态,马克思主义穿上“民族外衣”的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进言之,“第二个结合”既要有文字、概念和语义层面的初始契合,更要有深入思想精髓的深层次的契合,在二者的互融互化中建构新理论。

“机械结合论”的错误在于过度拘泥于理论,以忽视现实的此在性做形式上的相加,使“魂脉”和“根脉”进行生拉硬扯的结合。破解“机械结合论”的关键之道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吸收、彼此扬弃的过程中完成向他者的过渡与转化,进而实现创造性融合。

三 相融相通:“魂脉”和“根脉”的内在契合

通过对上述错误思想认知的澄明,我们深知“魂脉”与“根脉”的结合是可能且必要的。但这一结合并非立足于抽象思辨的必须之上,而是以二者的内在契合性和相互共通性作为逻辑前提。考察“魂脉”和“根脉”的内在契合,不能单纯停留于概念或范畴的相似性维度上予以阐释,而应深入二者的理论特质、思维方式以及价值理念中,去探寻彼此融通结合的“同类项”。唯有从理论向度对二者的契合点进行精准把握,才能使后续关于如何进一步延展契合空间、扩展契合点位等问题的研究做到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一)理论特质的兼容互通

理论特质指的是某一理论或思想在理论品格与精神特质方面的外化表现。体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品格,不难发现二者在理论特质方面存在互通性,正是这一层面的契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为二者结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相契合。两种异质文化的结合,一大前提条件就是两种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收并蓄。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它本就是在汲取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诞生的[6]30。马克思主义无意于构建封闭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自己陷入画地为牢的窠臼之中,而是以与时俱进、求同存异的态度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历史上不少学派都随着其缔造者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没落,然而马克思主义并未如此,因为其开放品格为后人留下了向未来展望的诠解与实践的余地。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孔子主张和而不同,《礼记·中庸》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①,这种有容乃大的胸怀使中华文化成为唯一能够绵延至今的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既有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有开放多元的盛唐文化精神,还有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现象,更有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化盛世。这种包容而不排他、协作而不对立、对话而不对抗的交流互鉴状态,在多元中塑造了文化整体,在和谐中造就了百花齐放。这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独特品格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具有契合之处,使得国人能以包容接纳的文明心态去看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寻求内在”的理论气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相契合。“寻求内在”即为内求,指在事物内部探寻其发展规律,而不依赖外在的超验或权威。马克思主义从不将希望寄托于外在的救世主,而是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具体实际,以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坚持眼光向下,并致力于解决具体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注重发挥人的作用,主张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全人类解放,兼具“寻求内在”和“向下超越”的特质。中

---

① 文中引用典籍的文字取自“爱如生典海:中国基本古籍库”。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具有“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儒家之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道家之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等，皆是这种精神特质的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向下超越的特性。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将目光从“六经”和单纯的思想层面中移开，借“六经”以开生面，由重思想转为重现实，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向下关注中国现实，形成了对中国现实的主体性理解。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皆是从现实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去理解并改造世界，才促进了二者在理论特质上的相契合。

(二)思维方式的相通互济

思维方式表征的是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体现了某种理论或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如果说两种文化在理论特质上的契合加强了二者结合的系统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契合性则促进了二者的精神接近，进一步提高了二者结合的高度。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相契甚深。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学说是不可分割的，客观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以批判的视角承继了古代辩证法的卓越成就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进而创立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辩证法学说。这一学说的诞生标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路径与视野，为人类社会的思想演进与实践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引导着无数的探索与创新在其理论光辉的照耀下不断展开与深入。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主张从事物的对立统一面思维，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7]528，是对“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8]297 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9]22 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具有内在的否定性，在肯定事物暂时性的前提下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主张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中理解世界。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10]225 这一观点指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就在于对立统一规律。从特定意义而言，矛盾的对立面不但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持续消解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以往那种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超越，为辩证法确立了新的基础，也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辩证的演进实质上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富有能动性的建构过程。据此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性就体现为从变动之中洞察发展趋向，于发展进程中探寻内在规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变易观念与辩证法思想，其在内涵、实质等维度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与相通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变易、辩证思维有着尤为深刻论述的当属《周易》与《道德经》。《周易》讲“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发展观点与阴阳、刚柔相推相交的辩证思维，此正为辩证法的真谛。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惯于运用“有”与“无”等两两相对之范畴思索天道变易的规律，以此阐释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且彼此转化的辩证关联，为世人理解世界的复杂特性与变动情形提供了深邃的思考视角和理论基石。诸如“有无相生”“福祸相依”等论断着重凸显了对立面的依存性与统一性，意味着对立并非绝对不变，对立面具备相互转换的可能，充分彰显出老子的辩证思维模式。孔子所倡导的“执两用中”以及孟子的“经权”思想，亦蕴含着辩证思维的元素。以孔子“执两用中”来说，“执两”讲求叩其两端，却又不被两端束缚，进而追寻“用中”“致中和”的思想境界，此乃注重变易的辩证思维方法。此外，中国人秉持“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这表明中国哲学中亦涵盖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辩证关系的认知。这种辩证思维方式逐步沉淀并熔铸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里，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互契合、彼此促进。

(三)价值理念的融通互彰

一种理论持有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追求，彰显了这种理论的文明底蕴和价值理念。任何一种文化或思想都有其内在的价值理念。综合考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发现二者在价值理念上是融通互彰的。这一层面的契合为二者结合提供了深层理据。

在价值立场上,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人民立场与贯穿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本思想不谋而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11]17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是指以人民立场为现实基点,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在论及人的解放问题时,马克思认为解放就是要“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7]46。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向人自身的回归在本质上体现为对人本质的全面且充分的占有,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着重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创造者,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295 所言,马克思将人民视作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相信人民拥有无穷智慧,能够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自我本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尚书》中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深刻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人心向背视作国家兴衰关键因素的民本思想理念。儒家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重视民众、休养生息以养民、促进民富以及教化民众等诸多方面。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承担起“庶民、富民、教民”的责任与义务,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孟子看来,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皆为民设,君也为民设。荀子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所提出的“载舟覆舟”之论历经岁月洗礼,在当下依然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与尊崇。道家也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着重强调治国应以民为要。如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于老子而言,圣人达至无我之境,将百姓之心视作己心,以百姓的诉求、意愿及志向为自身的追求与目标。管子则依据民心的向背来阐释治理的策略,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始终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认为为政之关键在于使民众安宁。这一深植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与治理实践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表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与一致性。

在价值追求上,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自古以来所追求的天下大同不谋而合。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崇高愿景,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洞察与科学把握,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于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7]185。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中,不合理的分工与异化的劳动被扬弃,人的个体与类克服了互为外在的矛盾,从而转变为一种内在的互为条件的关系。如此一来,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图景中,阶级剥削不复存在,每个人都能自由活动,证明和充实自己的本质力量,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共产主义作为具有深远意义的远大理想,绝非与现实生活相互割裂的虚幻空想。相反,它深深扎根于对人类生活实践全面且深入的洞察之中,有着极为坚实的现实依据与逻辑基础。共产主义在其传播过程中最初能够被中国人接纳与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大同理想存在内在的亲和性与契合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此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理想社会的宏伟愿景。《礼记·礼运》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描述了儒家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构想,指出大同理想的本质是推崇社会公平,反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贫富悬殊。这充分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共同向往与不懈追求。这一深埋在中华儿女内心的大同理想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与思想源泉。

四　相化相成:“魂脉”和“根脉”的互相成就

“魂脉”和“根脉”彼此的高度契合从思想前提层面回答了二者能否结合的问题。正是基于其契合性,二者才能够进入有机结合的逻辑进程。在彼此契合向有机结合的演进中,无论是从结合的具体过程上看,还是从结合展现的实践样态上看,促进二者实现互相成就和双向赋能始终是结合的必然追求。由此,在对契合性进行探讨与阐释后,理应对二者互化互成所展现的生动图景进行整体省察。

(一)“根脉”滋养“魂脉”,充盈其文化底蕴与鲜活内容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其内在的差异性不可否认。但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2]18,才能不以外

在的状态存在，而是深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内化为一个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文化基因。在百余年来"以中释马""以马释中"的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自身的生命因子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既为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提供深层滋养，又为马克思主义开花结果供给宝贵养料，有力解答了文化上的"中西之争"问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联结真理与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文化底蕴和内容的丰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滋养，具体体现在百余年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面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赋予其中国特色；一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互释相通，以知行合一的传统哲学阐释和丰富实践观，以矛与盾的关系诠释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论证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浓厚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53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即"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3]707，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文化的精气神，使其成为蕴含中国文化和精神特质的理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联，在实践中加以丰富，确立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吸收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着眼时代主题与中国历史方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真正的共同体等思想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此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相融合，对其进行扩充，坚定不移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上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是充实与补益而非否定与消解。同时，这种补益不是狭义层面的话语表达，而是广义层面的内涵规定。从更深层次上看，这种滋养是基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进行考量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显或隐地涵养并充盈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基础。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从博物馆中的"藏品"跃升为滋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源泉。

（二）"魂脉"激活"根脉"，实现其更新发展与现代转型

一种文化得以更新和发展的体现不在于抛弃传统，而在于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继承传统、再造传统。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持续为时代的发展变化输送文化力量，需要在寻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中，在秉承中华原生文明优质基因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自身进行丰富、拓展，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便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就在于回答了"古今之辩"，二者的结合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绝如缕地存活和赓续，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放异彩般地复活和复兴，推动其实现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这种更新和转型具体表现为"分解、汰选、融合"三个环节的层层递进。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作用，首先体现为促使中华传统文化从体系化整体形态向分散化要素形态转换。中华传统文化是由众多文化要素相互联结所构建的整体，其赖以生成的现实根基乃是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社会。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开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系化形态亦面临解构，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能动效能唯有借助分散化要素形态方能得以施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有力地加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化整体形态的拆解，使其分化为零散要素，进而为融入中国现代化文化体系构筑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其次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针对中华传统文化要素展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甄别筛选。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是否契合中国具体实际发展需求这一动态标尺，以此考量中华传统文化的各要素。具体到实际中来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使之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适应。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要素，如等级观念、官僚主义、封建迷信等，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分析其产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肃清其不良影响；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要素，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因并发扬其精神实质。如《华严经》中的“不忘初心”是中国古人修心的重要方法,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其延伸至党性修养方面,提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再如,传统天下观建立在天圆地方的地理认知上,内含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通过将其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结合,我们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创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贡献了思想智慧。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最后体现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融合环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能只囿于文化层面,而需要着眼新时代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现代化中心任务等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运用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崭新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科学指引。因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传统文化赖以实现更新发展和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和条件,为中华文明打开了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创新空间。

(三)经由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以理论上的内循环实现文化量上的扩展,而是以思想解放为引领,力图克服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固有缺陷,在实践发展中探索新的文化生命形态,即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中,“生命体”意指有生命形态的独立个体,“有机统一的”和“新的”分别为生命体的限定词,也是理解这一新的文化生命形态的关键。这里的“有机统一”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为“基”,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支”,是整合多元要素的统一。这里的“新”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异质文化通过文化要素的优胜劣汰而实现的文化创新和再造。具言之,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激荡、互化涵摄与融合共生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新文化,这个有机整体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置性形态,也是世界文明丰富发展的创新形态。

作为“第二个结合”的新的文明产物,新的文化生命体实质上不仅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且也必将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之所以能够做到生生不息、长盛不衰,主要是因为其内蕴的稳定且连续的民族主体性和主体意识。鸦片战争后,在文明蒙尘的危机中,中国共产党自觉主动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辨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理论品格和精神特质助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第二个结合”所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以其自觉能动性、民族主体性、时代创新性,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事实上,在创新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形态和价值层面的独特表达,同时又内在地蕴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性、世界性。就此而论,新的文化生命体体现中国特色、民族个性与世界特征、人类共性的辩证统一,是基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大坐标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时代表达,是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所呈现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集中概括,因而是一种超越资本发展逻辑,同时指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开创性文明,实现了对世界文明的反哺。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1).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王淑萍.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界融合”的思考[J].河北学刊,2007(2):18-21.

[6] 段妍.“两个结合”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25-30.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